



俞颂华文集

葛思恩 俞湘文 编

商务印书馆

俞颂华文集

葛思恩 俞湘文 编

商务印书馆

1991年·北京

封面设计： 李有良
责任编辑： 陈应年
版面设计： 梅素华

俞颂华文集

葛思恩 俞湘文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893-X/G·146

1991年2月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19千
印数 0-1 600册	印张 12 1/4 插页 2

定价：4.65 元

代 序

胡 愈 之

俞颂华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不幸的是自从1941年在新加坡一别以后，两人就不再见面的。由于太平洋战争，国内外消息不通，直到1948年我回国后才知道他已病故。现在能够重读他的生前著作是不胜感慨的。

谁都知道俞先生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是教育家。但更重要的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虽然他终生不参加任何政党，可是他从头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以后就和瞿秋白同志等，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通过战事尚未停息的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访问，会见了列宁和莫洛托夫。十月革命初期的俄国，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是俞颂华先生首先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是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的榜样。他们的报导，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共第一次合作，有一定的影响。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观了三个多月，然后去德国和西欧各国，一面进行考察，学习哲学和逻辑，一面仍为国内报纸写通讯。直到1924年，他回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及其他大学教授，并兼任《东方杂志》编辑。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毁于炮火之下。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聘，担任《申报月刊》总编辑。史量才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以后，《申报月刊》改为周刊。月刊和周刊都由鲁迅和茅盾等撰文，为当时销行最广的进步刊物，与《生活周刊》同

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他去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历时十六天。他回沪后写的延安报导，曾经在《申报》上发表，但大部分被国民党检查官删掉了。

“八·一三”事变以后，俞颂华先生离开上海，到内地担任地方报纸编辑，宣传抗日到底，但和国民党发生矛盾，不能畅所欲言。到1941年他就去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历时不过九个月，因报社主持人不赞成抗日，只好回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幸免于难，1947年10月11日因久病不治，去世于苏州。

俞颂华先生竟不及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但是把四、五十年以前他的著作发表出来，使青年们认识这位爱国主义的新闻记者的过去的想法，这是大有好处的。

一九八四年三月

新闻界之释迦牟尼—— 俞颂华先生

黄 炎 培

突闻俞颂华先生在苏州逝世，一时间惊愕，悲痛，不可名言。

先生为我二十年老友，十五年前，共事于申报馆，其后先生去香港，去南洋办报，通讯未尝有间。对日抗战初期，先生寓重庆南温泉，我去郊外写文，先生则以卧室让我。既而先生去衡阳，民三十年复来渝。先生体素弱，至是羸瘦益甚，同寓张家花园职教社屋，先生居“比乐堂”东偏，吾居菁园二楼，衡宇相望，先生伛偻，手大杖，每闻得得声，则先生至矣。战事有变化，国际有消息，必约谈，冷御秋、杨卫玉、孙起孟、沈肃文皆张园寓公，危堦斜坡土屋中，抵掌天下事，极友生之乐，而一发之于国讯。战后东归，天各一方矣。然通讯而外，隔数月犹得一相见，见必纵谈时事，先生故多病，初不意倏然长逝如此其速也。

先生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熟于国际掌故，富于爱国心和正义感，评论时政得失，一本其严气正性，不少假借，而出以至诚，故当局不以为许，亦犹先生之对后进，苟审其行为过当，面斥之，不少假借，而出以至诚，人无不感服之也。

“人生为一大事而来”，既认定某大事，便须忠于其事，专于其事，将一生精力尽力献于某事，先生者，其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乎。

先生于国事，于世界事，向主乐观，以为事态的演变，绕了若干大圈，结果终是前进，祇是牺牲太大为可悲耳。先生时时鼓励吾人以大公至正的立场，代表人民，参与政治，抗战中期以后，凡我所有行动，经过友人督导者为多，先生盖督导我者之一也。清晨或深

夜，得得声忽来室外，则先生至矣。谓某事君应如何处理，某问题君应如何主张，其意极坚决，谓不如此，绝对不行，然吾人前后意见从未乖迁，则真极友生之乐矣。先生自己则绝对不愿参与政治，愿以大公至正的立场，代表人民，评论政治，惟愿评论政治，故不参与政治。

先生往矣，先生真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也。

纪念颂华

钱 梅 先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视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北京人民出版社（我的记忆力已衰退，也许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分别派来了同志，向我了解颂华和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鲁迅等的关系。秋白和颂华于1920年同去苏联采访之事，我知道一些。至于颂华和鲁迅等的关系，我却一些也不知道。他们有的人说：在鲁迅的日记中，发现1933年12月某日，颂华和黄幼雄曾以《申报月刊》正副主编人名义，邀请鲁迅、茅盾等十来人在新亚饭店晚餐；有的人供给我情况说：在《申报月刊》创刊号上所载茅盾的一篇《林家铺子》，原名为《倒闭》，由颂华去信征得茅盾同意后，才改名为《林家铺子》。只怪我对颂华的事业关心不够，所以这些事我都不知道。

我虽知道颂华生前的进步朋友、学生，尤其是进步笔友着实不少，但他对家里人也都不说，我也不过问。除非象黄炎培、金仲华、俞寰澄、胡愈之、邹韬奋等一向露面的知名人士，则我也认识。当时，中央电视台同志，还为我录音录像，可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却使我穷于应对。

不久，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来人来信要我们家属为颂华写一部传记，说是“党不能让俞先生的革命业绩湮没”。我只得把女儿湘文、女婿葛思恩唤来商讨此事。只因颂华一生奔走于新闻事业，和家人离多聚少，加以他又不轻易对家人和朋友谈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女儿、女婿了解的情况也不多。加之，我已年过九旬，难以担

起这重任，只能先把我所知的情况，结合女儿、女婿收集到的部分资料，集中地叙述一下，以资纪念。

家庭出身

颂华是江苏太仓人，1893年3月9日（光绪十九年正月廿一日）生于上海；1947年10月11日在苏州逝世。

他的父亲俞柰云（书祥），在太仓考中乡试第一名秀才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放弃仕途，迁居上海，学电报业。在上海电报局中，从学徒逐步升任为电报局总办，并在上海、太仓创办了电报学堂，为国家培育了许多电报业人才。

柰云公和夫人顾颖芝，对四个子女的培育，十分重视。长女庆英曾服务于教育界；长子庆恩（凤宾）为上海名医；次子庆尧（颂华）为新闻工作者；幼女庆棠是社会教育家。他们的成长和成就，和他们父母亲的思想影响及悉心培育是分不开的。

我的父亲钱菊人（澄簪）也是太仓人，是和柰云公一起考中秀才的。他们两人结了金兰之谱，所以我和颂华的结缡，是在年幼时就依双方的父母之命订了婚约。1916年又在双方家长的迫促下结为了夫妇。因此，婚前对颂华是怎样一个人，可以说几乎是一无所知。

新婚期间，颂华曾告知我关于他学生时代的情况。他说：他的中、英文基础是在私塾里奠定的。那时，他家境不宽裕，每天早晨去私塾前买一只粢饭团当早餐，从此得了使他一辈子身体虚弱的胃病。在中学时代，就爱好读报、剪报、贴报，立志从事新闻事业。他曾先后肄业于上海健行公学（同盟会江苏支部主办）和澄衷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参加其兄俞凤宾组织的救护队，赴革命军战斗的前线南京、浦口等地救死扶伤。中学毕业后，他考上北

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但他认为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学术空气自由,就改入复旦公学,毕业于政治经济系。

我和他结婚的前一年(1915),他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1917年我生下第一个女儿时他曾回国一次,后于1918年夏毕业。

颂华原名庆尧。他在日本时,接触了新思想后,即去掉排辈的“庆”字,改名“俞垚”,后又取号“颂华”,取其歌颂中华之意。他开始办报后,又以“澹庐”为笔名,表其“澹泊明志”之心。有时在他所写的文章后面,仅署“澹”、“华”、“记者”以及我对外没有用过的名字“雪芳”等名。那时,他曾嘱咐我说:“我毕业后,决心放弃我所应得的祖上遗产(包括他嗣祖留给他的遗产),我们今后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初出茅庐

颂华于1918年从日本回国后,生了一场伤寒重症。此后于1919年4月下旬,应《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之邀,开始主编该报的副刊《学灯》,历时三个月。

《学灯》为五四时期三大副刊之一,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齐名,颇受读者欢迎。原为周刊,1919年初改为日刊。颂华接编后,革新版面,充实内容。如1919年5月16日,刊出《特别启事》,通告“《佛门丛载》,暂时停止”。同时又发起关于“社会主义”征文。他自己在该刊上用“澹庐”笔名,从5月到7月间共发表了37篇文章(参看著作目录)。

同一时期,《学灯》还刊登了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和介绍、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如郭沫若最早的两首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张闻天的处女作《梦》,及叶圣陶的早期作品,都是在那时的《学灯》上发表的。又如1919年5、6月间,刊载了来稿《社会党泰斗马克思

之学说》、《列宁著〈俄国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等。7月份的《介绍新刊》栏中,介绍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后又转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还刊登过李大钊、陈望道、杨昌济等的文章。

这是颂华初出茅庐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

如 愿 赴 苏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颂华留学日本时,就倾心向往社会主义,所以他一进《时事新报》,就向好友张东荪提出要求派他赴苏联采访。张东荪知道颂华通英文、日文、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不懂俄语;要派,必须再派懂俄语的翻译人员同去。这样,光凭他一个报馆的经济力量是不够的,因此介绍颂华和梁启超(任公)相识。适梁启超于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后,痛感西方国家垄断国际新闻,认为中国必须派自己的记者赴国外采访,因而决定帮助颂华,由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合派他去苏联采访。

其时,我对颂华个性的倔犟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尚未洞察。同年7月以前,我在北京的父亲钱菊人,事先没有征得颂华的同意,就贸然把颂华推荐给北洋政府派驻海参崴的特使李家鳌充任日文秘书,并来函催促克日前去就任,不料颂华执拗地不肯离开他心爱的新闻工作岗位,我只得劝说:“你不肯去,叫我父亲怎样向他的朋友交代?你去试试,觉得不合适再回来好了。”他才于7月下旬交卸了《学灯》编务,搭船去海参崴。谁知他临行之前,已向张东荪表明,他去一去就要回来的。张东荪就替他出主意,叫他在回程时到天津再去会见一下梁启超,促使梁启超助成他去苏联之事。

他去海参崴,不到三个星期就回来了。我诧异地问他怎么这

样快就回来了？他只对我说：“我一见到李家鏊，他就取出一篇日文，命我译成中文，给他看了后，他怪我怎么‘的’呀‘了’呀的全是白话文。他既然瞧不起我，我就不告而别回来了。”他却没有告诉我曾去了天津，并由梁启超介绍他再去北京，直接和北京《晨报》总编辑陈博生商妥，由两报合派他去苏联采访，并允许可以聘请帮他翻译的人员同去。这时，他已诸事俱备，只欠东风——即翻译人员的选派。我却还被蒙在鼓中。

颂华又回报馆去了。张东荪要他暂时一同主编《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到1920年年底前后，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瞿秋白投寄来两篇译文，一篇是托尔斯泰著的《告妇女》，另一篇是《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颂华把这两篇译文发表在《解放与改造》1920年3月1日出版的第五号上后，从此，就和秋白常有书信往返。

到同年10月前的一天，颂华忽然兴致勃勃地向我说：“我即将去北京，再到苏俄。”此话实是出乎我意外，但心想：“他是决定了要怎样做，什么人都阻挡他不住的。”我就什么话都不说了。适我父亲来信，叫我带了小女儿同去北京，我就赌气带了女儿先去北京回娘家了。

几天以后，颂华也到了北京。一到就去俄文专修馆找到了他从未见过面的瞿秋白。此后，瞿秋白也来过几次，他就和秋白及该校另一位也要随同去苏联的学生李仲武一起到《晨报》馆。联系结果，三人均以两报特派员名义，同赴苏联采访。

其时，苏俄内战未息，西伯利亚铁路不通。去之前，交通问题须得未雨绸缪。颂华打听到陈广平即将去莫斯科就任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于是去陈广平处要求同行，陈不想多事，婉言拒绝。那时，李家鏊已从海参崴回到北京，颂华就硬着头皮，和瞿、李两君一起去见李家鏊。颂华原以为他上次去海参崴时不告而别，可能要碰一鼻子灰；没有想到他这次去向李家鏊说明来意后，李却对他十分

器重。他后来告诉我说：李家整倒称赞他是热衷于新闻事业的“有志之士”，并说：“应该有人去苏俄作一次实地考察。”当时，李主动带他们去见陈广平，面嘱陈带他们同行，陈只得答应了。

1920年10月6日，颂华偕瞿、李两君和陈广平一行人员自北京出发，到车站送行的有郑振铎、瞿菊农、耿济之、郭绍虞等。我母亲带了我女儿也到车站送行，我则因第二胎即将分娩而未到车站。女儿回来后告诉我说：当火车开动时，其他去苏联的人们都已进入车厢，唯有她的父亲一人，站在车厢的门口，满面春风地挥动呢帽，向月台上送行的人们告别。颂华终于如愿以偿了，却毫无留恋地同我母女两人分离了将近四年之久。

抵苏访德

1920年10月20日，他们抵哈尔滨，正值红军与谢米诺夫白军在西伯利亚作战，铁路中断，遂在哈尔滨耽搁了五十天。他们即在哈尔滨开始采访，并写了报道，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上。

12月10日，交通恢复。由于他们和陈广平总领事同行的便利，得以搭上第一班列车离哈尔滨向满洲里进发。此时，秋白曾和颂华商讨在苏联的采访计划。据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记述：“途中，和领事等谈话外，就和颂华商量调查俄罗斯的方法。新闻记者的责任，照实来说，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后来，在三十年代瞿秋白到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在我家住过（这是王淮冰同志提供的情况，我当时虽在家中，颂华没有向我道出他的姓名），并曾用“犬耕”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

他们进入苏联境后，在赤塔也作了采访和报道。直到翌年

(1921)1月25日晚,方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颂华会见了列宁、莫洛托夫、托洛茨基等苏联领导人,他在苏联作了广泛的参观访问,写了许多通讯,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作了如实的报道。1921年5月19日,他在莫斯科火车站和瞿、李两君依依惜别,独自到柏林去了。

他的旅俄通讯是在柏林写完的。北京《晨报》连载后,深受读者欢迎,曾经辑成《游记第二集》一书,多次再版。

颂华和我分别后,家书鲜通,也从未给我生活费。我生下第二个女儿,约两年后,此孩夭折。不久我带了约六岁的大女儿回到上海,食宿靠颂华的老家供给,但其他生活费用没有着落,遂由颂华的胞妹庆棠介绍我到小学里当抄写员,后又当家庭教师、小学教员等,以供给女儿进小学读书,维持生活。

颂华在柏林,《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仍任他为驻德特派员。他写了许多《柏林通讯》,并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逻辑学、欧美各国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各国历史等,常到柏林大学旁听,曾听过爱因斯坦的讲课。

在柏林,1921年8月,留德同学会邀请他去作了一次访苏观感的演讲。这期间,他遇到了曾和他一起留日的老同学郭虞裳、笔友刘秉麟(南陔)夫妇等;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朱家骅、金井羊、吴经熊等,也认识了朱德。他会见了德国总统兴登堡,又周游了欧洲各地,两次赴法国巴黎。周恩来是他去巴黎时相识的。

他在柏林和瞿秋白仍经常通信。有一次,秋白信中告诉颂华,他在莫斯科贫病交迫,颂华就去信请北京《晨报》,取消自己“特派员”的名义而帮助秋白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得到了《晨报》的同意,改任颂华为《晨报》“特约通讯员”,按稿件付酬了。这样,他固定的薪金仅靠上海《时事新报》提供。1924年春,支持他的张东荪离开了《时事新报》,他受这影响,不得不搭船回到久别的上海。我们到

船码头去迎接他，见他的船舱是那样的昏暗。但就在这昏暗的船舱中，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译述了德国斯登堡著《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一书，于同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海 外 归 来

颂华在海外时，尽管鲜有家书，然而我知道他的私生活很严肃，所以在这方面，我很放心并引以为慰。

他回国后告诉我说：“这只结婚戒指，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左手的这只无名指。在柏林时，留德同学们常邀我同去参加交际舞会。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的舞伴怎么都是些徐娘半老的妇人？你把结婚戒指脱去吧，那些年轻姑娘就都愿意作你的舞伴了。我宁愿如此而没有听他的话。”

颂华回沪时，张东荪已在主持中国公学。颂华先在家中为《时事新报》写了多篇社论和给其他刊物的文章。到新学期开始，他就受张东荪之聘，任中国公学教务主任兼教授。这一时期，我就不出外工作了。

江浙战争时，因老家在南市老西门，接近战区，兄嫂全家已搬到租界暂避，我们也就从此脱离了老家，迁居公共租界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文德坊石库门房子两楼两底的下层。颂华拿出蔡子民（元培）送他的行书横幅和于右任亲笔书赠的对联，命女儿悬挂在客堂壁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和他们相识的，他的朋友实在太多了。

曾听到颂华说过：张东荪聘请到中国公学的，都是三十岁左右即已学有专长、备受学生欢迎的好教授，教授中有颂华的好友郭虞裳、金井羊、笔友金国宝（侣琴）等，还有高阳（践四）、郭德华，霍白等。他们不仅成为颂华的莫逆之交，而且他们的家眷也和我们

成了通家之好。

数年后，张东荪因学校经费不足等原因辞去职务，颂华以及这些教授和他共进退，都离开了中国公学。其时，颂华主要靠他的稿费收入来维持一家生活。

《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经宇)是颂华在复旦公学肄业时的老同学。1927年的一天，钱智修亲自上门邀他去任《东方杂志》编辑。颂华进了《东方杂志》后，写了无数国际问题的文章。过去他撰稿，绝大多数都署名“澹庐”，《东方杂志》因为要求编辑人员每月必须交足多篇文章，为便于统计起见，就署上“俞颂华”或“颂华”之名，从而使他又以“国际问题专家”著称。那时上海不少大学的校长都和颂华相识，所以他又被先后邀请到沪江夜校、东吴大学上海分校、持志大学、暨南大学、江苏教育学院、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劳动大学等担任兼课教授。主要讲授社会学、论理学(即逻辑学)、中国近百年史、新闻学等课目。

尽管他兼职那么多，但毕竟都是“清水衙门”，《东方杂志》的月薪又因他兼课而被七折八扣只剩百元左右。那时我们又添了一子彪文(1957年在北京中国保险公司任办公室副主任时去世)，加上颂华的交游，日广一日，家用渐增，因此我就要求颂华介绍我进了培成女校任初中语文教师，以贴补家用。

主编人钱智修自从离开《东方杂志》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后，特来信相邀，许以监察委员，月俸大洋六百元。颂华不慕荣利，复信谢绝。商务总经理王云五要颂华接任《东方杂志》主编，颂华不愿将老朋友的“主编”名义取而代之，借故推辞，仍任编辑。王云五乃改请胡愈之为主编。

1931年，上海“中社”创办了《新社会》半月刊。该刊从第二期起，主持人李孤帆请颂华去兼任主编，月给五十元。颂华只要有报刊可办，再忙他也乐于接受。他接任后，开辟稿源，革新版面；在该

刊上主张革新政治、抗日救国，使它在上海出版界中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刊物。同年年底，颂华定要將家搬到了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附近闸北宝山路中兴里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内，我因离校太远，只得辞去了培成女校教务。

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闸北宝山路上居民群相避难。颂华则听到官方内幕消息，说是国民党当局已和日方妥协，不会打起来，我苦苦劝他躲避一下，他执意不肯。那时我父亲已告老和我母亲一起来沪住在租界上，我只得把一双儿女先送到我娘家，然后又回到闸北，硬把颂华也拉到了我父母家中。当夜，遥闻枪炮声，我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了。闸北商务印书馆和我家旧居都毁于敌人的炮火。

《东方杂志》不得不暂停发行。其时上海不少报刊也相继停刊。“中社”的《新社会》也难于维持，乃由俞寰澄提出愿意负担纸张、印刷费用，颂华则自告奋勇，愿尽义务继续主编《新社会》，该刊遂得以照常刊行，热情地支持宣传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此时，颂华兼课的大学也被迫停课。我只得再度走出家庭，仍回到离我娘家较近的培成女校担任课务，又一次度过了全家生活的难关。

责 任 重 大

1932年是《申报》创办六十周年。《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其时已聘陶行知、黄炎培为《申报》顾问，在他们的建议下，史量才特地在同兴楼设宴邀请颂华去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颂华于5月份去《申报》馆进行筹备，两个多月后，一个大型综合性杂志《申报月刊》创刊号于同年7月15日出版了。颂华凭着他交游广阔，约了许多学术专家与进步人士撰稿。创刊号上发表了武靖干、俞寰澄、林语堂、胡愈之、潘光旦、舒新城、翁昭垣、张明养等的文章。文艺作品